

一体多面、冷热相殊与记忆交缠

——论战时中国文人的清明节书写

高 强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成都 611756)

摘 要:清明节是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倾力描摹的传统节日。抗战时期,清明节既成为提示、凸显和强化中国文人国族伤痛的时节,同时,清明时节的“不‘清’不‘明’”现象,还被作家当成审视现实、批判现实的有力手段。与现实中黯淡的清明景象有别,战时中国文人在回忆性文字中倾情捕捉和渲染着往昔清明节的风光之美和风俗之美。记忆中光鲜亮丽的清明节是当下战争灾害和生存苦痛刺激人们怀想出来的浪漫化形象,是战时中国文人一种独特的身份维系之举。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曾将清明节改造成民族扫墓节,政府的热烈提倡在作家文人那里却反响冷淡,甚至成为战时作家讥刺、批判的对象。政府官方和作家文人对民族扫墓节的不同态度,是不同社会记忆机制的表征。归根结蒂,一体多面、冷热相殊和记忆交缠,便是战时中国文人清明节书写的意涵所在。

关键词:战时中国文人;清明节;国族伤痛;现实批判;浪漫怀想;记忆交缠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5-0062-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507

清明节是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倾力描摹的传统节日。就清明节的节俗含义而言,它既是人们祭扫坟墓的节日,也属于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节气,是人们外出踏青游玩的好时光,结果清明节便兼有肃穆悲伤和欢乐愉悦两种情感氛围^[1]。清明节的两副面貌和两种情感氛围在战时中国文人笔下都有着较为鲜明的呈现,作家文人们选择表现哪副清明节面貌和哪类清明节氛围,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方式来自具体表现,都与创作主体的思想立场和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同时,传统的清明节在抗战时期还被国民政府加以利用改造成“民族扫墓节”,战时中国文人对政府此举大多回之以一种冷落的态度和语气,解析双方的差异,也是深入理解战时中国思想文化图景的重要窗口。

一、不“清”不“明”的清明节:国族伤痛与现实批判

清明节的主要目的是祭扫祖宗坟墓,表达对先人的思念之情,因此沉痛肃穆便是这天的主要情绪氛

收稿日期:2021-05-10

作者简介:高强(1994—),男,重庆彭水人,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半殖民与解殖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BZW138);重庆市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大后方的节庆纪念与文学镜像研究(1931-1949)” (CYB20117)。

围。而抗战时期,国家受难、满目疮痍,文人的清明节观感自然痛上加痛,清明节成为提示、凸显和强化战时中国文人国族伤痛的时节。

署名豹的作者首先表示清明扫墓是中国人最为注重的礼节之一:“我国数千年来宗法社会,习俗相沿,颇重视祖先,故朱柏庐有‘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之语。”但不幸的是,战争使得“四郊多垒,夜哭无人,战后之清明佳节,触景生情,有满目凄凉之感”。兵荒马乱之中的活人尚且“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又“哪里还有余暇顾到孤魂野鬼?”因此,作者慨然叹曰:“战祸蔓延,不但子孙将无立足之地,连祖宗都成了若敖氏之鬼,悲夫!”^[2]严独鹤也对战时清明节的破败景象深表痛心:“清明扫墓,是向来的习俗,但山河还未残破,丘墓依然完好,便有人祭扫,再想到白山黑水之间,经着敌人铁蹄的蹂躏,许多被难的同胞,许多临阵的健儿,丧亡垒垒,白骨山积,哭望天涯,招魂何处,又是否觉得可痛?”^[3]清明节在民间还有“鬼节”之称,而战争状态下的清明节,正好处处显现出“鬼相”:^[4]“生活艰苦,朝不保暮,路倒尸触目皆是,人和鬼,看来只是一纸之隔吧!何况行尸走肉者有之,尸居余气者有之,有的人挣扎在饥饿线上仅剩残喘,有的人空有躯壳,早没灵魂,有的人却连人气都没有了,更有些是鬼鬼祟祟的在鬼混着,教人有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感叹!”^[4]

在不少虚构类作品里,清明节书写也成为作家表现人物生存苦痛进而反映国族伤痛的有效方法。在程应镠的小说《扫墓》里,柏老爷清明节这天领着众人回乡扫墓,这个经历却让柏老爷一行切实目睹了一片凄凉景况:乡民们被征收着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门牌捐,碉堡捐,公路捐,人丁捐,保甲捐……”应有尽有,让人们苦不堪言;兵荒马乱,柏家陵墓数次遭人偷盗挖掘,“连睡在土里的人也要遭劫了”,战争下民不聊生的状况可想而知。柏老爷“踏遍了世界上的坏地”,只有故乡在他的回忆中占据着重要而柔软的位置,只有那和着他二十多年的光阴一齐埋葬了的故乡,“有蜜似的甜,蔗似的甘,春风似的柔媚,秋月似的清幽,女人眼珠子似的娟好,暑雨初收似的天空的澄明,四月南风中的大麦似的丰实”。可是清明回乡扫墓的见闻却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故乡的残破,“见着的是一片荒凉,听着是百种呻吟;豪强的兼并,绅吏的榨取,把丰腴的农村的面影削减下去了”^[5]。李侍冰的小说《清明节》首先描绘了一幅北国清明节的苍凉景致:“北国的清明节已失却了往日的轻快,陷入于湮灭的深渊里了似的,大地全然混沌着,苍凉阴郁得怕人。附近的村落,冒出了稀松得可怜的炊烟,许多肥沃的土地全荒芜着。桃李一若感染了人类的不幸般的,枝头仅仅多荷些残缺的花瓣。对岸公路像一根笔挺的白线,这白线上的行人出乎意料的稀少,纵然有,那便是三五成群,抱着孩子,背起包袱,挑着破锅和农具,逃到能够生存的地方去的难民。”在此图景中,大龙嫂带着儿子小五到村口等候已经离家三年的父亲,最终无功而返。母子俩回家后,小五的病急剧恶化,穷困的大龙嫂只得听从李大娘的建议拜佛求仙。大龙嫂所不知情的是丈夫已经在前年因为暴动被鬼子给活埋了,“这可怜的女人,还以为丈夫仍然活着,常怀着春天样的希望的花朵,和每个女人共通有的恋情,热烈的盼望着丈夫早日回来”^[6]。不几天,小五也因病去世,大龙嫂只有凄切而悲恸地啼哭着。村里人在清明节外出逃难,大龙嫂在清明节枯等已经丧命的丈夫归来,儿子小五又在清明节前后离世,一个农村苦命妇女的清明节故事完美地折射出战争带给国人和整个国家的深沉创痛。

正如著名宗教学家杨庆堃所言,祭祀祖先是中国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宗教内容,清明节的扫墓“意味着对祖先供奉的责任”,在这种祭扫活动中存在一种强有力的情感源泉,“足以强化血缘价值观和家庭的关系纽带”^{[7]99}。而战争的来临不但极大影响和阻碍了人们的清明祭奠行为,还使得活人生存的环境也变成了一副肃杀残败的“鬼像”。当国家受难、人民遭罪的伤痛场景不断从战时中国文人的清明节书写中涌现出来时,战乱之痛和清明节本身的时节沉重就彼此叠加、相互增进,经由清明节这一时节显露出来的国家和民族的伤痛无疑更具震撼性和感染力。

在时令气候上,“清明”原本是一个时和气“清”、春光“明”媚的佳节,当得起名副其实的“清明”二字。战时中国文人却在清明节这天纷纷发出不“清”不“明”的愤激之言:“其实‘清明节’万物都在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然而同时返顾到宇宙之间,是否‘清明’,是否生气勃勃?唉!说也可痛。那‘清’遗傀儡,由敌人牵着线,‘明’火执仗于东北。而国内盗匪充斥,未能尽量廓‘清’。尤其是在这世风颓下之日,欲求‘清’高而‘明’廉的人,犹如凤毛麟角。而其余的一切,也都是‘不清不明’,以致外侮日亟,内乱更甚,怎不可惊!”^[8]“说甚清明,却是黑浊。清明者,时节之清明;黑浊者,时局之黑浊。剑拔弩张、视耽欲逐,辜负了大好春光,桃红柳绿,但只见漫天也似的毒雾,笼罩那神州大陆,但只见倒海也似的毒浪,来打那荒江老屋。”^[9]

“清明”不“清”不“明”,这种对比反差进一步成为战时中国作家进行现实批判的有力手段。署名忝生的作者表示战乱中的自己漂流在外,“逢到‘扫墓时节’不是忙就是窘”,祖宗的坟墓,也许早已湮没了。不肖子孙的罪状,自己是逃避不了的,但是祖宗也“不免有一点不是”。他以质问的语气写到:“为什么祖宗不多积些造孽钱,好让我这样的子孙逢时逢节多孝敬一点。或者多念几年书,出一出洋,留一留学,得一个博士或什么之类,也可以骗骗人,赚点钱。更不该不积德,不然的话,也还可以做他一个什么部长院长,或者县长之类,还可以替祖宗造一个伟大的陵墓,更阔气一点,还可以开一条墓道,预备扫墓时行使汽车。”这番话与其说是对祖宗的抱怨,毋宁说是对现实社会中诸多不公平现象的批判,基于此,作者最后才由衷感叹说:“窘人们对祖宗是永远对不起的,祖宗活着的时候,既不能仰侍,死后就是勉强弄了一口棺材埋了,在应该扫墓的时候,也不能够扫一扫,为着生活的鞭策抽不出空,为着窘困没有钱,这年头,做鬼也有幸与不幸,就连扫墓这一件权利,还是属于某种人的。”^[10]

张天翼的中篇小说《清明时节》可以说是借清明节来进行现实批判的典型文本。小说写一个小镇上的地主豪绅为一块祖坟地进行的一场明争暗斗。这场斗争,一方以谢老师为代表,一方是罗二爷为主力。谢家卖了棋盘角那块地给罗二爷,却没有卖掉地中的祖坟地。罗二爷要谢家迁坟,谢老师打算借机发一笔财,出口要价五百元,结果被罗二爷怼了回来。清明节那天,谢老师和兄弟前去上坟,却被罗二爷雇的看坟人辱弄:“上坟你上去你的好了,没哪个不准你去。不过你们不能够踩上我们的地!”^[11]¹⁴谢老师气愤之下骂了一句“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便被看坟人打了一巴掌。受辱后的谢老师请寄住自己家里的三个兵大爷吃了一顿饭,向他们哭诉了自己的遭遇,三个兵大爷“好管闲事”,“也受过罪,吃过别人的亏”^[11]³⁹,便主动答应要打罗二爷一顿,替谢老师报仇解气。罗二爷被打后,要求部队和官府予以彻查,扬言要揪出幕后主使。担惊受怕的谢老师这时竟然主动上门找到罗二爷,将三个兵大爷供了出来,以保自己的平安。而且,谢老师最终也以二十块钱的低价被逼同意迁出祖坟。小说通过这场迁移祖坟地的斗争,重点刻画了一个充满“奴性”的乡村士绅形象。张天翼本人曾自陈说,他对谢家兄弟清明节上坟的受辱场景写得较为简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学着要写的是生活,不是故事。要插点事件进去,那完全是为了要表现他们生活里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影响。写这些事件只要够使那些人物起反应就行了”^[12]¹²⁸。的确,小说中真正属于清明节的描写笔墨是偏少的,但清明节所占篇幅的多少与其在传达小说意蕴层面的作用并不成正比,相反,清明节的受辱恰好引发了谢老师后续的一系列“反应”,而且谢老师后面由强势逐渐转为弱势的反应和他在清明扫墓时的受辱遭遇形成了强烈对比,有助于揭示谢老师虚假可悲和自甘为奴的性格。小说命名为“清明节”,则是以清明节本来应该具备的肃穆之气来反面突显谢老师的滑稽形象。凡此种种,都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深化了小说的批评力度。

战乱哀痛的反映和奴化性格的讽刺在林榕的小说《清明前后》里得到了共同呈现。金家是正芬镇上一个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老大哥金伯渊住在镇上,三弟是县里的县长,二姑姥爷在山东做旅长。清明将至,包括三弟和二姑太太等一众亲人都回到镇上祭扫祖坟。当县长的三弟回来时特意带了三个荷

枪实弹的保安队长,作为路上的防御。清明前夜,一家人谈起匪乱问题,伯渊说:“近来很少听见闹匪了,据说开来了一团军队在路上驻扎着呢?”三弟回答道:“不错,军队开来了,匪闹得是好一点。可是那军队呢?到处一走也够瞧的,真顶得上土匪呢!”清明一家人上坟时,伯渊的儿子子明玩弄保安队员的枪支,不小心朝远处放了一枪,很快即有一排兵士跑来将伯渊和子明以“匪徒”的名义捉走了。第二天镇上的人们便聚在万顺昌杂货铺里闲谈,说伯渊已经被打得浑身伤痕累累。有人讥讽这简直是“草木皆匪”,“只要一动,枪一响,人家便疑心是匪了”;伯渊是个老好人,却遭此诬赖,人们纷纷感叹“兵,是兵吗?这算是保护地面吗?诬赖好人!”“兵本来就跟匪一样啊!”于是,人们便去往金家叫他们托一些人情,解救伯渊父子。就在伯渊和子明要被砍头时,村董们赶去将二人解救了出来。三弟因为县里的公事繁忙,在家待了几天后就回去了。回去前,他结算了这一次的清明用款,足足二千元之多。但转头一想:“回到县里教派公益捐,特别捐……问题不就解决了吗?”^[13]军队如匪,乡民一不留意就会被诬陷、抓捕、毒打,甚至杀头,这是战争乱象的一个缩影;而三弟在亲人遭到伤害后,不仅不思反抗,反而苦苦琢磨着怎样在农民身上设法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是民众奴性心理的一个缩影。不论是战争乱象,抑或是人性陋习,都属于战时中国现实语境中的真实元素,清明节则成为战时中国作家文人审视现实、批判现实的利器。

二、记忆中的清明节:浪漫怀想与身份维系

“清明真是一个奇异而富于矛盾性的节日,因为它一方面是赏春寻乐的时节,一方面又是悲哀断肠的时节。”^[14]如上所述,悲哀断肠的清明节面貌在战时中国文人笔端与国族伤痛感怀和现实缺陋批判相互勾连。清明在二十四节令之中,正值春回大地、吐故纳新之时,是人们踏青郊游、亲近自然的好时段,故而清明节又是“赏春寻乐的时节”。赏春寻乐的清明节面貌在战时中国文人的现实清明节书写中难觅踪影,却大量存在于战时中国文人对往昔清明节的追忆之中。

记忆中的清明节之美,首在风景之美。对此,公兰谷浓墨重彩地写到:“清明时节,野外的景致显得格外清雅和美丽。麦田和草坪编织成绿色的绒毯,杨柳林子起伏着浅黑色的波浪。山中桃花闹得正盛,红白相间,似片片彩霞。黄莺在杨柳林中飞梭,不厌烦地织着春之林野这块秀丽的锦缎。明净蔚蓝的天空中浮荡着各式各样的风筝,雪花般的柳絮在各处风舞着,软软的东风袅袅在吹,把人的心吹得发软发腻。最好的自然还是登山。桃花开满山坡和溪谷,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有秋千和美人。山店中虽没有临风招展的酒旗,人家却有尘封多年的美酒,和经冬桑叶泡制的甜茶,对于陌生的客人,主人们都毫不吝惜温情的招待。回首下望,山野中的一切完全收入眼底:山田层层相间,仿佛传说中的云梯,如带的小河发着翠蓝色,蜿蜒绕着村庄,村庄如刻着精致花纹的古玩,村屋排排列列的比邻着,好像鱼鳞一般,整个山野像一幅唐人名贵的山水画。沿路有闻不断的花香,听不尽的鸟语,还有看不穷的山景随意浏览,折不完的山花随手采撷。山中的风吹得软软的腻腻的。受着软风吹,望着山下麦田中安歇少女们的红绿衣服,游山人的心中,便发生出一些富有香艳气息的美丽的幻想,口中哼着梁山伯祝英台的情歌,想着旧说部中公子游山遇艳的故事,巴不得自己也在这深山无人迹的地方遇见一位绝代佳人。”^[15]作者绿岩也深情回忆说:“曩时在故居的时候,每每到清明时节,我总是尽日的跋涉,忙着上坟。在我故居的周围,风景是很优美静穆的,那里有围绕十余里的小溪,有同蓝天一色的远山。绿树苍松,竹篱茅舍,颇具有世外桃源的风味。更何况那时又是没有饥寒的呼喊,没有挣扎的呻吟,人民安居乐业鸡犬不惊哩。我们家的坟墓,也就在这个水木清华的地方。犹记得儿时常随父亲去扫墓,这虽是一些很平凡的小事,而在我的心中,十余年来,尚没有把他忘掉,这也是一个甜蜜的回忆啊!龙尾岗的坟地,是在几曲的清溪

围绕中,苍松万株,绿荫深浓。有一次我随父亲去上坟,焚化纸钱以后,就在浅草地上躺着,让那从树叶空隙处漏下来的阳光在我的身上荡漾。春雨新晴,溪水增涨,潺湲的流水,发出来淅淅的繁音。松树招来了清风,飘飘缈缈地奏出仙乐般的声音。几丛紫藤花附在老松树干蜿蜒而上,到了树巅,忽又倒挂下来。每到春天,紫色的藤花,就一枝一枝的垂下,绿云深处,香雪霏霏。我们临去的时候,又折了盈筐的半开的花,回家蒸食,其味很好。父亲爱作诗,这一切,真是要给父亲以很多的诗料啊。”^[16]

若将文章的发表时间和文中的相关说明文字隐去,很难相信此类美奂绝伦的风景描写语句会出自战时中国文人之手。风景书写在抗战文学之中当然并不鲜见,反而非常活跃,不过抗战文学的风景主要呈现为两种面貌:要么是被敌人践踏导致的残败晦暗的阴性风景,要么是象征人民力量的伟岸雄壮的刚性风景,前者是对敌人暴行的反映,后者是对民族美德的褒扬和对抗战力量的动员。^[17]因为这两类风景的观念性过于强烈,所以它们在抗战文学中的呈现方式显得大同小异,甚至给人以一种千篇一律的单调审美感觉。与之相比,战时中国文人的往昔清明节风景书写则显得情真意切、细腻感人,尽管此类风景书写也是由现实处境激发的结果,但它们与政治观念的贴合程度较为松弛,没有刻意将风景上升到民族隐喻的高度,所以时过境迁依旧能够予人以强烈的审美体验。

记忆中的清明节之美,次在风俗之美。公兰谷回忆他故乡的清明节共有三日,清明前一日是寒食,寒食前一日是一百五,都算在清明节之内。三天时光都充满着令人记忆深刻的美丽风俗。“一百五”之名来自“一百五添土”的俗谚,这天是为祖坟添土的日子:“添土乃是清明节扫墓外的节日,不像孟兰节等扫墓一样,只烧化纸钱,陈列一些供品就算了,这之外,还要在坟上添几筐新土,意思是给祖先们修葺一下房屋。”寒食节原是纪念介之推母子的,但乡人们大多不晓得这个故事,更不了解“寒食”这两个字的意义,到了这天,“只是依照旧风俗过过节日娱乐一场罢了”。寒食节吃彩色鸡蛋和打秋千是作者念念不忘的民俗:“一想起寒食,我便会想起彩色鸡蛋和秋千。当清晨尚在睡梦中时,忽然觉得被窝里滚进五六个圆溜溜热烘烘的小东西,睁开眼睛,恰真看见母亲的笑脸。母亲见我醒来,就笑着说:‘天亮了,起来吃鸡蛋吧!’我这才知道,那五六个小东西原来是染着各种颜色的鸡蛋。看见染着红色的鸡蛋,我就想起年画上的关公脸,寒食、红鸡蛋、关公脸,这三件东西那时我幼小的心灵中是分不开的。本来,在寒食前一月人们就开始打秋千了,只是打秋千的情景以寒食为最热闹。在寒食这天,年青的少妇和姑娘们都成群打伙的到邻家打秋千,打扮得花枝招展。平日她们都是足不出户的,连在大门口站一站都会遭到父兄们的禁止,今天却可自由自在地走遍村中所有有秋千的人家。年青的伙子们也混杂在姑娘群中,有的是含情的眼波,有的是盈盈的笑语,有的是调笑的言词和举动。寒食还有一种食品叫玉米仁饭,是用玉蜀黍和麦仁做成的,那饭实在太香了,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鼻端似乎还逗留着那饭的香气。”如果说寒食是家内的节日,清明便是野外的节日。清明踏青在公兰谷的记忆中主要成了青年男女相互传情的场合:“清明是踏青的日子,一吃过早饭,青年男女便都拥到郊外去,只剩下老年人在家看守门户。年青的姑娘们打扮得比寒食的时候还艳丽,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唇上点着鲜红的胭脂,穿着颜色很重的红绿裤褂,小脚上是一双绣花鞋子。青年男女们拥挤在麦田里,各采一把麦苗放入鞋中,这便是所谓‘踏青’。青年男女们互相对望着,各用含情的目光搜索着每张脸子,最后停在一张自己心爱的脸上,假若这张脸子的主人也爱着这个看者,于是四只眼睛就呆呆的凝视起来,最后相互含情的一笑,这一笑早把两个人的心魂笑出体外去了。回得家来,双方都必神魂颠倒,言语无味,茶饭无心,眼前时时幌着那付节哀的脸子,精神恍恍惚惚直有数月之久,害起相思病。男的必各方设法,托媒婆向女家求亲,如若不成,就在三更半夜爬墙头去和女的幽会,做出被乡人们骂做不知羞耻的举动来。”^[15]

“汉魏之前,时令性的宗教祭祀活动是岁时节日的基本内容;汉魏以后,岁时节日成为民众季节生活民俗享受与展示的方式。”^[18]公兰谷记忆中的清明节正属于“民俗享受”的岁时节日,作者对一系列

温馨的民俗场景的回忆无疑是对安宁祥和岁月的深情凝望,这番回忆越是动人、越是沉迷、越是热烈,越是能够反衬出战争烽火下的怅惘。因此,公兰谷最后便为自己的回忆画上了一个沉痛的句号:“我离开故乡六个年头,战火在故乡烧了六个年头,听说故乡现在已经变成疮痍满目,十室九空。在这远远的异乡,想起故乡从前清明节的美丽情景,我只有挥之一泪了!”^[15]

往昔清明节和现实惨境构成了强烈对照,记忆中的清明节光鲜亮丽、熠熠生辉,但它却显得虚无缥缈,它“是一种丧失和位移,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19]2},即是说,记忆中的清明节是当下战争灾害和生存苦痛刺激人们怀想出来的浪漫化形象。尽管如此,战时中国文人依旧热情地回忆和渲染着往昔清明节的美好。无论是记忆中清明节的风光之美还是风俗之美,都是当下的困苦处境对战时中国文人刺激后产生的结果,这些灿烂美丽的往昔清明节记忆的回望和捕捉,与战争苦难构成了强力衬托和彰显,更是战时中国文人的一种独特的身份维系之举。因为,记忆中的清明节安详温馨,它“树立起了与现行标准相对抗的标准”^{[20]188},让人们能够从战争灾难中暂作逃遁,进而自我安抚。哪怕记忆中的清明节是脆弱的、粉饰的、想象的,但战时语境下人们的身份依靠就是由类似的微小记忆所顽强维系着。

三、被发明的民族扫墓节:热烈提倡与反响冷淡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将清明节改造成为民族扫墓节,每逢此日,政府会派员致祭黄陵、周陵、茂陵、昭陵等先人陵墓,同时也号召民众在民族扫墓节这天开展祭祀民族先贤的活动。国民政府此举隐含着强烈的政治意图,但民族扫墓节的提倡在作家文人那里却反响冷淡,甚至成为战时中国文人讥刺、批判的对象。这一热一冷的情形折射出战时中国思想文化交锋和不同记忆交缠的繁复景致。

民族扫墓节的问世与邵元冲、于右任、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的宣传倡导密切相关。1933 前后,邵元冲、于右任、戴季陶等人都曾在陕西拜祭黄帝陵、周陵、茂陵等先圣陵墓,而后鼓吹官民均应该在清明节这天祭谒这些陵墓,以便唤醒和发扬国民的民族精神。除邵元冲等人的提议之外,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策略也是促成民族扫墓节得以推行的缘由。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上海、华北接连制造事端,逐步蚕食中国,民族安危存于一线之间,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冀望通过民族扫墓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各方的资源整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减少华北分裂势力的冲击。另一方面,从 1934 年开始,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强调维护和复兴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此层面上,民族扫墓节又与“新运”政治策略一拍即合。种种原因使得民族扫墓节很快即被确立推广开来,1935 年清明节前夕,政府表示为了“激发人民的民族观念起见”^{[21]40},规定每年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由国府中央派员前往祭扫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同时祭祀周陵、茂陵、昭陵等。1937 年春,为了凝聚民心,一致对外,国共两党还共同参加了轩辕黄帝陵的祭祀活动,成为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国民政府将传统的清明节俗创设成为民族扫墓节,此举是对传统进行的一种“发明”,民族扫墓节便是一种“被发明”的节日。对于旧传统的“发明”,是旧用途的调整发生于新的环境中,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22]6}。国民政府使用清明节的“旧模式”而“发明”民族扫墓节的“新目的”是:“复兴民族,建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自信心,……予民众以最大之刺激。”^[23]

民族扫墓节的设置实行并非受到所有作家文人的“冷遇”,依然有人对民族扫墓节表示欢迎,尤其对民族扫墓节在振奋民族精神层面的效用赞赏有加。李黎洲即从三个层面详细分析了民族扫墓节的重大意义,是作家文人正面评价民族扫墓节的代表。李黎洲说:“家庭之成立基于血统,民族之成立亦大部分基于血统。”家庭是中国人过去生存的单位,祭祀祖宗便局限于家庭范围内。近代以来,国人的生存单位则扩展为民族,祭祀祖宗理应同时扩大到民族范围内,“举凡有功于民族之先圣先贤均在崇敬之

列”。民族扫墓节恰恰是民族范围内的祖宗祭祀倡导,它的效用“足以激发民族纪念其过去,并以鼓励民族创造其将来;而在国民训练上,实为一种有效之历史教育,冀使每一个国民都能本于‘亲亲’‘追远’之义,‘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尽其至孝’也”。其次,民族扫墓节这天不光祭祀先祖圣贤,同时还祭奠抗战阵亡将士。而一个民族历史的延续进展有赖于两种优秀分子:“一为平时贡献其一切以增进群众之福利者,二为在非常时牺牲其一切以解除群众之危难者”。阵亡将士属于后一类优秀分子,人们在民族扫墓节时对他们“深致其敬仰”,将使人们深切体悟到:“个人之生存实寄于民族之生存,个人之不朽实寄于民族之不朽,个人之至上实寄于民族之至上;质言之,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而同时小我生命之真价亦即以成立”,此种精神是铺就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石。最后,李黎洲还认为民族扫墓节纪念先贤先烈同时是国人切实反省的机会,人们在民族扫墓节的纪念过程中可以深切认识到,“中国民族厚爱和平,并无保障和平之准备”,“吾人只有国家而乏国防”是中国遭受侵略的主因。从而以民族扫墓节纪念为契机,提升人们对战争实力的认识,有助于“从抗战中确定建国之中心工作”^[24]。民族扫墓节被赋予了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抗战力量的内涵,所以濮澄女士在散文纪游作品《到香山去》里特意将学生们的游行示威安排在民族扫墓节这天,当天学生们在郊外看见有人领着祖孙祭扫祖坟时心生感慨:“也曾有人五年前向他们祖先的坟墓洒下几滴泪酒,坯上几把黄土;但五年后,民族扫墓节倡导的今日,他们祖先的坟墓荒芜了!儿孙流浪了!有谁人送他们那些流浪儿回老家去凭吊?”后来,学生们一路前行去往香山,然后高唱爱国歌曲、表演爱国戏剧、高呼爱国口号,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愤激情绪,整个活动充满了“力的号召!”^[25]显而易见,民族扫墓节与充满“力的号召”的学生举动构成了一对彼此促进和相互彰显的关系。

李黎洲分析民族扫墓节所具备的三大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尚且说得通,可在现实语境中却很难得到落实;濮澄女士正面构设民族扫墓节的做法在战时中国文人笔下更是难得一遇。与之相对,民族扫墓节是绝大多数战时中国作家、文人奚落、批驳的对象。

民族扫墓节试图通过对先圣先贤的祭拜表彰,来强化国民的民族自信和战斗力量,进而促使广大民众共抗日寇。换言之,民族扫墓节被赋予抗战救国的巨大使命和效用,这一点受到作家文人们的深刻质疑。曾迭首先从“民族扫墓节”这个名词入手发出批评说:“我们不曾听说过我们的民族是在什么时候死亡过,我们更没有把我们的民族的躯壳,埋葬在什么地方过,当然也无处可以找到我们的民族的坟以及‘中华民族之墓’的碑文等”^[26],所以“民族扫墓”的说法便是不通的,给人以莫名其妙之感。即便姑且同意“民族扫墓节”的命名方式,曾迭也对该节日的价值深表怀疑:“也许吊古是中国人的一种嗜好,中国文学中,因吊古而产生出的文学作品,确然不少,但这只不过是若干伤感家的精神病作用。我不知吊古的结果会生出什么新的意义来,同如民族扫墓之后,民族即会复活否也。”^[27]乙木更是以谐谑的语气讽刺了妄图以“民族扫墓节”来救国的做法。据说人到危难之时,便想起爹妈来,这叫作不忘本;作者举例说:“某人行一独木桥,惟恐失足,走一步,便暗中叨念‘我的妈’一声。”喊妈并不是胆怯,而是不忘本。国难之后创造民族扫墓,正是“不忘本之意”。不过“某君行在独木桥而不致失足落水,是否有他的先人阴云扶助,则不得而知了。”^[28]言外之意,祭奠民族圣贤是否即能够保证国家不亡,大为可疑。鲁迅虽未专门针对民族扫墓节著文发言,但他曾在描写清明节的文章中严厉谴责了“扫墓救国”的思想:“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29]⁴⁸³

民族扫墓是向死者借力,这一点饱受诟病。与之相反,作家文人们则呼吁与其在死人身上玩弄花样,还不如切切实实为活人做点实事:“现在,有若千万不忘祖先的人在这清明节想去扫他们的祖墓。可是他们祖宗的墓地已不容做子孙的踏上一部。政府既提倡民族扫墓节,第一应该使东北人流浪在外

的能够回去扫祖墓。不然,只是扫扫明陵,祭祭黄陵,做做空面子,太对不住欲扫祖墓而不得的东北人了。”^[30]“民族扫墓节的意义不过是游子追思祖先之业绩而勤勉将来,以无愧于在天之灵,所以纪念死者最终的目的老实说,还是为了生人。所以我一向以为在纪念‘死的’时,更应该加紧救救‘生的’,免得加增‘死的’数目和纪念资料,而多保存一些‘生的’力量。”^[31]

在古代中国,烧纸钱、祭拜等清明节行为属于一种纯粹和虔诚的价值表达仪式,但在无意识间,它们也构成了大众“参与到统治他们的帝国奉天承运的宇宙秩序的神秘与魅化过程”^[32]¹³⁰的一种方式,后者深受“五四”以来的传统批判和思想启蒙理路的指斥。清明祭祀扫墓本就被视为一种迷信退步的表现,如今竟然以政府的名义号召全体国民投入到祭拜扫墓的大潮之中,这不能不引起作家文人们的警惕乃至愤慨。范烟桥认为子孙对于祖先埋骨之所,自然应当时时去看看,可是要说扫墓和整个民族生死攸关,或者说,因了人民都能不忘祖先,民族就繁荣起来了,这就有点“莫测高深了”^[33]。此外,不加反思和限定的民族扫墓倡导更会使得整个民族陷入追慕祖先光荣、自我美化的陷阱之中,严重妨碍国民精神的生长进步。有鉴于此,君德以决绝的语气告诫道:“我们不是乞灵于枯骨,我们也不是借光于死人,因为我们确定我们是有我们的时代,当然我们更有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把祖宗的极盛时代来炫耀,犹之乎意大利的复兴,不能就说是罗马时代的重现一样。”^[34]快刀更是贬斥民族扫墓是复古逆流,其结果极有可能致使民族“入墓”:“近来以来,中国之思想学术界,实一逆流之时代,恢复固有文化之一名辞,为人曲解为‘中体西用’或‘古是今非’,由现在逆流至于五四以前,由五四逆流至于有清同光时代,更逆流至乾嘉时代,更逆流至汉唐时代,汉唐犹未尽古,倒车非至开至太古洪荒之时代不止。于是中国文化尽善美矣,又尽善也,于是吾人不知今日为‘秦欤?汉欤?将近代欤?’今日人民为‘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于此次‘耍骨头’游戏中见其一端。呜呼!民族扫墓!呜呼!民族入墓!”^[35]

总之,民族扫墓节是国民政府官方在清明节的传统节俗基础上加以改造、“发明”的一个全新节日,其意图是通过全民族对先圣先贤的祭拜和追念,来凝聚和强化国民的民族认同、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进而团结一致共赴时艰。政府的热烈提倡到了作家文人那里却受到了冷遇,与政府对民族扫墓节寄予厚望不同,作家文人们普遍对民族扫墓节的提倡所隐藏的思想危害警惕有加。而“不同的社会记忆机制往往与不同的制度及文化价值或观念相联结”^[36]²¹,政府官方和作家文人对民族扫墓节的不同态度,正是不同社会记忆机制的表征。政府官方提倡民族扫墓节,试图在国民身上强化团结进取的集体记忆;作家文人对民族扫墓节的冷言冷语,则是一种思想独立的个体记忆的顽强存续,两种记忆的交缠折射出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彼此颀颀。

四、结语

战时中国文人笔下的清明节存在着两副面孔:当他们描写现实语境中的清明节时,整个情绪氛围与清明节思念亡人时一般肃杀哀愁,现实语境中这副冷冰冰的清明节景象,有效传达了战时中国文人的国族伤痛,也强化了战时中国文人现实批判的力度;而现实生存的苦难则促使战时中国文人大量回忆起了往昔的清明节时光,记忆中的清明节呈现出风景亮丽、风俗动人的特点,它虽然是战时中国文人的浪漫化怀想,但这番热烈的追忆却安抚了人们此在身份的破碎与创伤。现实语境中的清明节和记忆中的清明节,就这样构成了战时中国文人清明节书写两种面向,且显现出一冷一热的差异。

另一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曾把传统的清明节改造、“发明”成了民族扫墓节,此举的意图是希望通过人们对先圣先贤的追念,来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众的抗敌斗志。政府的热烈提倡到了作家文人那里却大受冷落,后者指责民族扫墓节的设置和倡导存在着有名无实、自我美化、引人遁入复古逆流等

诸多缺陷。政府提倡民族扫墓节,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刻写策略,而作家文人对民族扫墓节的反感,则是一种个体记忆的反刻写行为,两者的共存是两种记忆交缠的表征。有关民族扫墓节的言说理所当然成为了战时中国文人清明节书写的又一副重要面孔,而民族扫墓节在作家文人层面和在政府层面的遭遇,同样显现出一冷一热的区别。归根结蒂,一体多面、冷热相殊和记忆交缠,便是战时中国文人清明节书写的意涵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黄涛. 清明节的源流、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功能[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5).
- [2] 豹. 清明墓不扫[N]. 力报, 1938-4-6(2).
- [3] 独鹤. 清明[N]. 新闻报, 1933-4-5(17).
- [4] 今司马(夏衍). 腐言: 清明[N]. 社会日报, 1942-4-5(2).
- [5] 流金(程应镠). 扫墓[J]. 青年作家, 1937(2).
- [6] 李侍冰. 清明节[J]. 文艺与生活, 1947(2)(3).
- [7]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 范丽珠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8] 萧亢石. 清明杂感[N]. 新闻报, 1934-4-5(17).
- [9] 焕文. 清明歌[N]. 上海报, 1933-4-5(7).
- [10] 忝生. 零话之一: 扫墓[N]. 世界晨报, 1937-4-13(4).
- [11] 张天翼. 清明时节[M]//张天翼文集: 第三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 [12] 张天翼. 我怎样写《清明时节》的[M]//张天翼文集: 第九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 [13] 林榕. 清明前后[J]. 民教月刊, 1936(2).
- [14] 虚人. 清明时节[N]. 大公报, 1947-4-5(8).
- [15] 公兰谷. 清明节[J]. 文潮月刊, 1947(2).
- [16] 绿岩. 清明日[J]. 艺风, 1936(4).
- [17] 厉梅. 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
- [18] 萧放. 岁时: 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92-93.
- [19]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将来[M]. 杨德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20]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21] 支念慈编著. 纪念节日史略[M]. 上海: 新夏图书公司, 1937.
- [2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导论: 发明传统[M]//E·霍布斯鲍姆, T·兰格. 传统的发明. 顾杭, 庞冠群,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23] 关于民族扫墓[N]. 天津大公报, 1935-4-8(3).
- [24] 李黎洲. 民族扫墓节感言[J]. 时事半月刊, 1940(11).
- [25] 濮澄女士. 到香山去[J]. 光明, 1936(10).
- [26] 曾迭. 漫谈民族扫墓[J]. 论语, 1937(110).
- [27] 曾迭. 民族扫墓[J]. 论语, 1936(86).
- [28] 乙木. 民族扫墓[N]. 天津益世报, 1937-4-6(11).
- [29] 鲁迅. 花边文学·清明时节[M]//鲁迅全集: 第五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0] 九香. 扫墓[N]. 东方日报, 1937-4-6(3).
- [31] 舞彪. 春寒访问记十七: 民族扫墓节[N]. 新闻报, 1941-4-23(14).
- [32] 柏桦. 烧钱: 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M]. 袁剑, 刘玺鸿,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 [33] 范烟桥. 民族扫墓节的意义[N]. 新闻报, 1935-3-9(19).
- [34] 君德. 民族扫墓[J]. 社会新闻, 1935(4).
- [35] 快刀. 异哉所谓民族扫墓! [J]. 文化与教育, 1934(16).
- [36] 黄应贵, 主编. 时间、历史与记忆[M]. 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9.

One Body with Many Faces, Different Heat and Cold and Intertwined Memories —On the Writing of Qingming Festival by Chinese Literati in Wartime

Gao 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56, China)

Abstract: Qingming Festival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described by Chinese literati in wartim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Qingming Festival not only became an occasion to prompt, highlight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pain of Chinese literati in wartime, but also the phenomenon of no “clear” and no “clear” in Qingming Festival was further regarded as a powerful means for wartime writers to examine and criticize reality. Unlike the gloomy scene of Qingming Festival in reality, the Chinese literati in wartime captured and rendered the beauty of scenery and customs of Qingming Festival in their reminiscence. The bright and beautiful Qingming Festival in memory is a romanticized image stimulated by the current war disasters and the pain of survival, and a unique identity maintenance of Chinese literati in wartim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transformed Qingming Festival into a national Tomb-sweeping festival, but the warm advocacy of the government received a cold response from writers and literati, and even became the object of ridicule and criticism by writers during the war.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iterati to the National Tomb Sweeping Festival 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memory mechanism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Qingming Festival written by Chinese literati in wartime lies in the multi-faceted uni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ld and hot,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emory.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i in wartime; tomb-sweeping day; the pain of the nation; criticism of reality; romantic thoughts; memory entanglement

[责任编辑:孟西]